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陈天华与邹容



陈天华

一、“莫谓草庐无俊杰”

陈天华是一座警世钟！

在“中国其将亡矣”的危机时刻，他撰写了《警世钟》，为反帝爱国、反清革命大声疾呼，发出了振聋发聩、惊人醒目的警世长鸣。毛泽东同志充分肯定了《警世钟》对一代国民的巨大影响。他回忆自己读此书的感触：“自此，我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陈天华不仅用笔撰写了《警世钟》，更可贵的是，为了唤醒民众的救国觉悟，他勇敢献身，毅然蹈海自杀。成为“最有功于革命”的一代英雄。陈天华用自己的青春年华和血肉之躯溶铸了一座长鸣的警世之钟。

陈天华原名显宿，字星台、过庭，号思黄，1875年生于湖南省新化县下乐村。他自幼丧母，父亲是个教授蒙童的乡村塾师。由于家境贫寒，陈天华虽是塾师之子，却迟迟未能进入学堂，被迫“废学营小卖自给以求学”，靠着提篮叫卖和替人放牛，帮助父亲维持家庭生活。

学堂的门坎，并不能挡住小天华求知求学的渴望和努力。他从5岁起就跟随父亲识字读书，刻苦学习，9岁已熟读《左传》，能把书中的故事讲得绘声绘色。年龄渐长，他益加勤奋，孜孜不倦，偏僻山乡中能够找到的书籍，无论是史籍典册，还是《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传奇、小说、唱本，他都视同珍宝，反复诵读。他特别爱读除暴安良、慷慨悲歌的故事，每读至此，常常因沉浸其中而激愤填膺、涕泪横流。为了抒发胸中的意气，他便模仿作品的体裁即兴创作，写些文词流畅、情节丰富的故事或民歌小调。这为他日后写出感情充沛、文体通俗的革命宣传读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895年前后，陈天华随父徙居新化县城，居住于资江书院。走出重峦叠嶂的山乡，陈天华的视野一下子开阔了，甲午战败后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深重忧患和正在发生的剧烈变化，给他沉寂的心灵以巨大的震动。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之祸迫在眉睫，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昏庸腐败的清政府非但不进行抵抗，反而大力强化封建文化，用“之乎者也”、“石马弓刀”等文、武科举来消蚀中国人民的反抗意识。陈天华痛恨清政府的腐朽暴戾，同情广大劳动人民啼饥号寒、备受荼毒的苦难，从而激发起他对洪秀全、杨秀清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深深的景仰，痛恨镇压起义的曾国藩、左宗棠及其统率的湘军，认为他们是湖南人中的败类，万世之罪人。所以他“少时即以光复汉族为念，遇乡人之称颂胡、曾、左、彭功业者，辄鄙弃不顾，而有愧色”。陈天华立志澄清天下、救民水火。一次，他路过驿亭，面对祖国的破碎山河，不由胸中荡起九洲风云，激情之下，挥毫题壁：

莫谓草庐无俊杰，须知山泽起英雄。

以豪壮的诗名，表达了他以天下为己任，救国救民的雄心壮志。

因为父亲住在资江书院，陈天华一有空就到书院旁听。资江书院院长邹苏柏发现了他的才华，便说服族人给以周济，使他暂无衣食之忧，入书院求学，陈天华深知读书的机会来之不易，越发勤奋努力，“把书院的一部二十四史，整日整夜，细心研读”。史学巨著中夷狄侵华、民族兴亡的史实，不断牵动起他对时局的无穷忧虑，时而掩卷长叹，时而拍案而起。

1897年，陈天华正在资江书院读书之际，维新变法运动急剧高涨，湖南

因维新志士谭嗣同、唐才常等人的倡导，更称一时之盛。废科举、开议院、开矿产、修铁路、兴学校、改官制、禁鸦片等一系列变法主张，使陈天华洞开一窗，耳目一新。他认识到学习西方，维新变法，才是中国由弱变强的“新机”，是匡世济时的良策。此时，新化县也改革书院，建立了倡导新学的新化实学堂。实学堂的学生，学习西方的历史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教师也都倾向于维新。陈天华即离开资江书院，考入这所新式学堂。入学后的第一次作文，教师出了《述志》一题。他不假思索，把自己的抱负一挥而就，凝聚在仅百余字的短文中。

大丈夫立功绝域，决胜疆场，如班定远、岳忠武之流，吾闻其语，未见其人。至若运筹帷幄，赞划庙堂。定变法之权衡，操时政之损益，自谓差有一日之长。不幸而布衣终老，名山著述，亦所愿也。至若徇时俗之所好，返素真之所行，与老学究争胜负于盈尺地，有死而已，不能为也！

此文陈述了参与变法、改革时政的志向，且即使“布衣终老”也要著书立说，绝不能随时俗而与老学究在八股考场上争胜负。教师罗仪陆阅后，不禁拍案叫绝。写批语高度赞扬他对旧学的批判：“狭巷短兵相接处，杀人如草不闻声。”意为犀利尖锐，像利刃斩草一般的痛快淋漓。赞赏他不同凡响的志向和气概，把他评为一等第一名。

正当维新变法运动蓬勃发展时，封建顽固派发动了宫廷政变。谭嗣同等六君子慷慨就义，血染刑场。新政全部被推翻。1900年春，北方爆发了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给帝国主义以迎头痛击，可腐朽的清统治者却实行“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卖国政策，重新调整国家机器，加紧搜括民脂民膏，以偿还战争赔款。陈天华从维新失败和八国联军入侵的悲剧中，更深刻地认识了清政府的倒行逆施。从此他在愤恨之中刻苦求学，力图寻找新的救国之路。

国破之恨，又加家亡之痛。是年盛夏，天华父亲病逝，他星夜徒步返乡奔丧。由于忧伤过甚，身染重病，几近气息奄奄。直到1901年他才痊愈回新化实学堂继续读书。这时，年已27岁的陈天华每次考试“辄冠其曹”，在湖南学界声名大震。一位有名望的地方官员，非常器重他的才华，想将爱女嫁给他为妻，可是经历了国破家亡等一系列变故后，陈天华早已矢志以身许国，把儿女之情置于报国之后，因此他毅然拒绝说：“天下方多故，安能再以儿女情累我乎？国不安，事不娶。”

为了缓和人民一触即燃的反清情绪，统治者被迫诏令“变法新政”，实行以学校代科举等新政，其中派人出洋留学亦为新政之一。1903年春，陈天华由新化实学堂资助，作为官费留学生前往日本留学。从此，开始了他短暂生命中闪光的新阶段。

二、只身东渡挟春雷

1903年3月27日，数十名湖南留学生抵达东京，陈天华进入弘文学院学习。此时的日本，是中国进步青年一心向往的求学之地。那里先后聚集了黄兴、蔡锷、秋瑾、鲁迅、吴玉章等一大批革命先驱，他们“为求富国强兵策”，“只身东渡挟春雷”，在日本一边求学，一边进行宣传民族革命和民主思想活动。陈天华一到日本，立刻就被留日学生中浓郁的革命气息所感染。那些在国内闻所未闻的“大逆不道”的言论，使他感到痛快淋漓。陈天华如

饥似渴地学习达尔文《进化论》、卢梭《民约论》、《美国独立檄文(宣言)》等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政治社会学说，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同时，他还积极参加了爱国宣传活动。虽然因时间太紧“半年还不能说一句日本话”，但置身于浓郁的革命气氛中，他的思想却发生了迅速而巨大的变化。

是年4月，陈天华到日不满1个月，沙俄政府片面撕毁《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拒绝从东三省撤军，还蛮横地向清政府提出7项新侵略要求，企图永远霸占东三省。沙俄的无耻行径，激怒了中国人民，一场声讨沙皇的拒俄运动大举爆发。陈天华立刻投身其中。4月29日，他在有500余人参加的留日学生拒俄大会上发表演讲，沉痛地指出：“东北三省的存亡，关系着祖国和民族命运，决不可等闲视之。”并毅然参加被称为“死籍”的“拒俄义勇军”（后改名为“学生军”），以表达他“宁为亡国死，不为亡国人”的坚强决心。之后，他演习枪法，加紧操练，准备开赴东北前线，把沙俄侵略者赶出境外。同时，陈天华还满怀悲愤的心情“日作书报以警世”。他咬破手指，用鲜血写下数十封《敬告湖南人》的公开信，呼吁家乡人民“万众一心，舍死向前”，保卫祖国，共御强俄。这些血书，在湖南各阶层广泛流传，激起了强烈的反响。湖南巡抚赵尔巽大为感动，亲自到各个学堂去宣讲，“并揭之官报”，使血书成为传遍全国的战斗檄文。陈天华以热血警国人的事迹也由此传遍全国。

全国群众性的拒俄运动，吓坏了清朝政府，由于统治者奉行“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卖国政策，认为留学生“名为拒俄，实则革命”。所以谕令各省督抚对有革命意图的归国留学生，“随时获到，就地正法”。清驻日公使蔡钧还勒令解散东京留学生的拒俄义勇军。如此，爱国成了有罪，抗俄救亡变成了谋反叛逆，清政府已完全成为“洋人的朝廷”，人民的仇敌。要保卫中华民族，就必须推翻清朝政府，在拒俄运动的现实中陈天华也成长起来，开始从一个热烈的爱国者，变成了坚决的革命斗士。5月11日，陈天华与黄兴、蔡锷、秦毓鎏等青年志士，不顾清政府和日本政府的高压，以被迫解散的原拒俄义勇队为基础，组织了革命团体“军国民教育会”，并制定了“养成尚武精神，实行爱国主义”即武力反清新宗旨。矛头直指卖国的清统治集团。同时，陈天华还自认充当从事宣传革命和筹备起义活动的“运动员”，愿自备费用返湖南筹措经费，开展活动。当年初夏至仲秋，他参加编印《游学译编》、《新湖南》两本革命刊物，发表《论中国学生同盟会之发起》、《复湖南同学诸君书》等许多文章，积极鼓吹革命。此时，他还撰写了两本震动时局的小册子《猛回头》和《警世钟》，以期号召人民，抵抗侵略、“排满”革命。

10月，沙俄宣布中止中俄有关东三省问题的谈判，派兵重新侵占奉天省城，并限令东三省的中国官员在一个月內出境。气焰万分嚣张的沙俄，企图把中国东北变成“黄俄罗斯”。国难日亟，陈天华只觉天地塌陷，他“如痴如狂，如孤儿弱女之新丧考妣，奔走彷徨于故旧间，相见无一语，惟紧握友人手，潸潸然涕泪交横而已。”他大声疾呼“要革命的，这时可以革了，过了这时没有命了”，号召人民奋起革命，为保卫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生存而英勇战斗。悲愤至极，他决定不再留在海外仅作宣传，而要能言且能行，回国直接参与反清救亡，立志以捐躯报国。

三、睡乡谁遣警钟鸣

1903年初夏至仲秋，沙俄大敌压境，瓜分豆剖迫在眉睫，中华国土危在旦夕。这时，唤醒国民、救亡爱国成了摆在时代先驱者面前最迫切的任务。时代呼唤英雄，时代造就英雄。陈天华愤懑焦急，寝食不安，他顺应时代，挺身而出，挥笔疾书《猛回头》《警世钟》，用说唱形式和通俗显浅语言激发国民的爱国精神，敲响救国的警钟，两本书激情洋溢、悲壮感人，其中精髓首推强烈的反帝爱国思想：

“长梦千年何日醒，睡乡谁遣警钟鸣？
腥风血雨难为我，好个江山忍送人！”
“万丈风潮大逼人，腥膻满地血如糜；
一腔无限同舟痛，献与同胞侧身听。”

在这期间，每当他写到义愤填膺之处，便难以控制自己的感情，热泪涟涟。同桌同学石醉六回忆说，“每见他暗自哭泣，便知道他又写到一笔惊心动魄的字句上来了。”

在共有4万余字的《猛回头》、《警世钟》中，陈天华首先痛陈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急形势。自鸦片战争以来，列强已割占了中国的大片领土，划分了在华的势力范围，取得了种种侵略特权，中国被瓜分豆剖、亡国灭种的危机已是怵目惊心：

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
英吉利，假通商，毒计中藏；
法兰西，占广州，窥伺黔桂；
德意志，胶州领，虎视东方；
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
美利坚，也想要，割土分疆；
这中国，哪一点，还有我分；
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
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
压制我，众汉人，拱手降洋。

帝国主义侵略者是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敌人，他们，“割土分疆”，已使全国“没有一块干净的土地”“瓜分豆剖逼人来，同种沉沦剧可哀”，中国一旦亡国，人民将面临任人宰杀的亡国奴的惨烈生活：

苦呀！苦呀！苦呀！我们的同胞辛苦所积的银钱产业，一齐要被洋人夺去；我们的同胞恩爱妻儿老小，活活要被洋人拆散，男男女女们，父子兄弟们，夫妻儿女们，都要受那洋人的斩杀奸淫；我们同胞的生路，将从此停止；我们同胞的后代，将永远断绝。枪林炮雨，是我们同胞的送终场；黑牢暗狱，是我们同胞的安身所。大好江山，变成了犬羊的世界；神明贵种，沦落为最下的奴才。唉！好不伤心呀！

面对这种“是我们大家的死日到了”的险恶处境，陈天华并不气馁，他沉毅豪迈地号召全国人民紧急行动起来，抵抗侵略，保卫国土：

洋兵不来便罢，洋兵若来，奉劝各人把胆子放大，全不要怕他。读书的放了笔，耕田的放了犁耙，做生意的放了职事，做手艺的放了器具，齐把刀子磨快，子药上足，同饮一杯血酒，呼的呼，喊的喊，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满人若是帮助洋人杀我们，便先把满人杀尽；那些贼官若是帮助洋人杀我们，便先把贼官杀尽。“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

仇人方罢手！”我所最亲爱的同胞，我所最亲爱的同胞，向前去，杀！向前去，杀！杀！杀！杀我累世的国仇，杀我新来的大敌，杀我媚外的汉奸，杀！杀！杀！

在中华民族存亡绝续的危急之秋，这种豪言壮语，是何等的扣人心弦，何等的痛快淋漓。陈天华爱国情炽，早已“把生死，十分看透”，他激励全国同胞宁做鬼雄，不做“奴隶的奴隶”，为了捍卫祖国的完全独立，捍卫民族的生存权利，发誓与敌人血战到底。

在中国人民的抗敌呐喊声中，帝国主义的走狗清朝政府却置深重的国难于不顾，寻欢作乐，醉生梦死，一味残暴地盘剥人民：

自从俄国复占了东三省之后，瓜分的话日甚一日，外国的人都替中国害怕，人人都说中国灭种的日子到了；哪里晓得自皇太后以至大小官员，日日在颐和园看戏作乐，全不动心。今年谒西陵，用银 300 万。皇太后的生日，各官的贡献，比上年还要多 10 倍。明年皇太后七旬万寿，预备 1500 万银子做庆典。北京不破，断不可停的。马玉崑在某洋行买洋枪 3000 杆，要银数万两，户部不肯出；皇太后修某宫殿，80 万银子又有了。你看这等情形，还可扶助吗？

陈天华怒发冲冠，在《猛回头》和《警世钟》中不但深刻地揭露清政府的腐败，更形象地勾画出它帝国主义走狗的嘴脸：

须知各国就是瓜分了中国之后，必定仍旧留着满州政府压制汉人。列位，你道今日中国还是满政府的吗？早已是各国的了。那些财政权、铁道权、用人权一概拱手送与洋人。洋人全不要费力，要怎么样，只要下一个号令，满州政府就立刻奉行。

而人民若有抗敌行动，“他就加以违旨的罪，兴兵剿洗”，搞得“十八省中愁云黯黯，怨气腾霄，赛过那十八层地狱”。为了苟全一己，不惜出卖国家、出卖民族，这样的政府已完全成了“洋人政府”，洋人的帮凶，难道还可扶助吗？“他不要你勤王，你从何处勤哩？”作为一个赤诚的爱国者，陈天华鲜明的提出：“要想拒洋人，只有讲革命独立，不能讲勤王。”阐明了反清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他也如同孙中山、章太炎、邹容一样，把民主革命看做顺天应人、符合历史进化规律的运动，认为“革命者，救人救世之圣药也。终古无革命，则终古成长夜矣”！因此，在他的著述里，充满着讴歌民主、盛赞共和的文词，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企望独立自主、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要求。他坚信，只要把反帝反清革命进行到底，新中国必能在东方崛起，赢得似锦的前程。

猛睡狮，梦中醒，向天一吼！
百兽惊，龙蛇走，魑魅逃藏。
改条约，复政权，完全独立，
雪仇耻，驱外族，复我冠裳。
到那时，齐叫道：“中华万岁”！
才是我，大国民，气吐眉扬。

陈天华的这一惊世醒的民主思想，对后来辛亥革命的爆发，起了号手前驱的作用，撞响了反帝反清的警世钟。

陈天华蘸着热泪写成《猛回头》和《警世钟》具有巨大的革命感染力，一经刊出，便“风行于世，湘赣间尤甚，三户之市，稍识字者，即朗读《猛回头》”。尤其在湖北新军里，流传最广，“各兵士每每读《猛回头》、《警

世钟》诸书，即奉为至宝，秘藏不露，思想言论，渐渐改良，有时退伍，散至民间，则用为歌本，遍行歌唱。其效力之大，不可言喻。而文学堂之青年，亦时以偷看《猛回头》为乐。”清政府把这两本书当做大敌，广张文网，严行查禁，仍无法阻止它们流传，直到1906年，还有龙华会会员曹阿狗公开演唱《猛回头》，被劣绅告发后，惨遭杀戮。金华知府“广出告示，严禁逆书《猛回头》，阅者杀不赦，以曹阿狗为例。然此告示一出，而索观此逆书之人转多，于是革命之风潮乃又加紧一度矣。”反动政府的高压政策，反而使革命书籍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陈天华被誉为“革命党之大文豪”。

四、杀尽仇人方罢手

陈天华所撰《猛回头》、《警世钟》已在国内大量翻印、广泛流传，撞响了反帝爱国、反清革命的战斗警钟，但面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严峻形势，陈天华认为断没有自己不肯捐躯，反而鼓动他人献身之理，毅然决定以身作则，回国参加革命斗争。1903年冬，陈天华返抵湖南，与黄兴等人一起宣传革命，并组织策划发动武装起义。

11月初，陈天华、刘揆一等先后回到长沙，他们以庆贺黄兴生日为名，举行秘密会议。会议决定发起革命团体“华兴会”并发动武装起义。为避免清政府的注意，华兴会对外以“兴办矿业”为名，取名华兴公司，发行华兴股票。实际上是以“矿业”二字代替革命，“入股”代替入会，股票即是会员证。1904年2月15日，正式召开了华兴会成立大会，陈天华和其他与会同志一致推举黄兴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为副会长。会上，提出“驱除鞑虏，复兴中华”的革命口号，并一致通过“雄据一省”，各省响应的战略方针，决定以湖南做为首义之区，促使各省响应，达到完成革命大业的目的。会员进行了分工，陈天华承担了宣传工作与策动群众、军队参加起义的任务。

为宣传鼓动群众参加革命，陈天华一边补充、修改《警世钟》，使之广泛散发，在长沙书店里“罗列满布者，触手皆是”，一边到各地进行演说，“日与下等社会谈论中国大事。虽目不识丁者，闻之皆泣下”。同时，陈天华还积极策动军界、学界参加武装起义。江西吉安清军巡防营统领廖名缙创办随营学堂，邀请陈天华前往帮忙，陈天华认为这是运动军队的好机会，便步行赶往吉安，力图劝说廖名缙响应湖南革命，届时率领部队起义。华兴会的秘密革命活动，引起了清政府的密切注意，湘中反动官绅借端罗织罪名，派出大量暗探搜捕华兴会员。江西巡抚则指名通缉陈天华，要求“就地正法”。由于好友的催促，陈天华于1904年春末再次东渡日本，入东京政法大学。7月，他又不辞跋涉，渡海归国，继续策划起义。

其时，黄兴、刘揆一等成功地与湖南哥老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和哥老会的“龙头”马益福制订了在长沙起义的计划。陈天华回到长沙后，“华兴会”革命党领导人举行了秘密会议。认为通过半年多的积极活动，起义条件已经成熟，于是决定在阴历十月初十（11月16日）慈禧太后70岁生日那天，乘全省文武官员聚于万寿宫行礼祝寿之时，用预先埋好的炸药，将其一举炸毙，发动起义，占领长沙。马益福率会党分岳州、常德、浏阳、衡州、宝庆等五路同时响应。陈天华的新任务是与刘揆一一起，前往浏阳普积市举行马益福的少将授衔仪式。

9月24日，普积市举行传统的牛马交易大会，附近各乡镇的居民都来赶

集，人山人海，多达数万人。为了进一步发动和组织群众，陈天华和刘揆一借此集市，公开举行哥老会首领马益福少将的授衔仪式。刘揆一代表黄兴主持仪式，亲自发给马益福长枪 20 只，手枪 40 只，马 40 匹。仪式庄严隆重，观者如堵，在哥老会会员中起了直接的革命动员作用，“此后相继入哥老会者不下 10 万人。

10 月下旬，由于华兴会年轻的领导缺乏斗争经验，武装起义的计划不幸泄露。立时，反动政府发兵四出，大肆搜捕革命党人。白色恐怖笼罩湖南全省，长沙城内血雨腥风，不少会党成员惨遭杀戮。然而，反动派的血腥镇压，并未能吓倒革命志士，此时，陈天华经江西辗转至上海，与黄兴等华兴会同志重新聚会，在租界内创办启明译书局，作为策动起义的秘密机关，并分头运动军界、学界，准备在武昌、南昌继续发动起义。但不幸亦遭破获，黄兴等 10 多人先后脱险撤离，独有陈天华却正襟危坐以待捕。他说：“事不成，国灭种亡，活着也如同死了一样，何必求活呢？”直到第二天，经朋友力劝留下有用之身以图再举，才从容束装就道，再次东渡日本。

五、招集同志，合成大团

两次策划武装起义的失败，使陈天华觉得国家、民族前途渺茫，心情格外抑郁。1904 年底，重返日本的陈天华与一年多前的他已迥然相异。那时他慷慨激昂，满怀信心，希望从日本这个通过维新得到富强的国家寻求救国救民之路；而今他图谋反清一再受挫，实际上已成为亡命海外的朝廷要犯。于是他为祖国的前途日夜忧伤，甚至认为宁愿一死瞑目，以免目睹中华亡国的惨剧。直至 1905 年夏，孙中山来到日本，才使彷徨忧虑的陈天华重又朝气蓬勃，踔励奋发。

20 世纪初年，民主革命思想广泛传播，革命形势迅速发展，从事民主革命多年的孙中山满怀信心地指出：“中国现今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全国革命时机现已成熟”。但形势需要一个统一的政党来领导，而当时的兴中会、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光复会等革命组织，都是地域性的革命团体，难以担当领导全国革命的重任。孙中山吸取多次起义失败的教训，决心“招集同志，合成大团，以图早日发动”。就是要联合全国革命势力，成立一个全国性的革命组织，以领导全国革命运动。

1905 年上半年，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的一些领导人因长沙起义失败，相继逃到日本。孙中山抓住这一时机，来到日本与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同志，商议他所领导的兴中会与华兴会等革命团体实现联合的问题，以设立统一的会党，作为革命中坚。

7 月 28 日，孙中山到宋教仁、陈天华等创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社进行商议。陈天华首先介绍了长沙起义失败的情况，孙中山则据历次失败的教训，详细地阐明了联合各省革命团体、革命同志的必要性。他指出：“中国现在不必忧各国之瓜分，但忧自己之内讧。此一省欲起事，彼一省亦欲起事，不相联络，各自号召，终必成秦末二十余国之争，元末朱、陈、张、明之乱，此时各国趁而干涉之，则中国必亡无疑矣！故现今之主义，总以互相联络为要。”孙中山又殷勤呼吁：“若现在有数十百人者，出而联络之，主张之，一切破坏之前之建设，破坏之后之建设，种种方面，件件事情，皆有

人以任之，一旦发难，立文明之政府，天下事从此定矣。”这一席话，使陈天华耳目一新，他坚决拥护孙中山的主张，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然而，与兴中会联合问题，华兴会内部意见颇不统一。次日，华兴会的领导人聚于黄兴寓所，商决加入孙中山所建议的联合团体问题。陈天华竭力阐述联合的重要性，积极主张华兴会作为一个团体加入；黄兴主张形式上加入，精神上仍保留华兴会；刘揆一主张不加入；宋教仁则模棱两可，认为尚需要研究。其他人亦各有所说，各持所见。由于意见不统一，最后是以“个人自由”一语而告结束。这次会议虽未能就华兴会与兴中会联合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但陈天华的鲜明观点对一部分迟疑不定的人有明显的启发，会后不少人改变了态度，使多数人赞成联合。陈天华鲜明的态度，说明了他对联合问题的重要性，比华兴会中其他人看得更清楚。

7月30日，孙中山在东京召集并主持了建立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筹备会议。兴中会、华兴会及其他革命团体的代表共70多人前往参加，陈天华为发起人之一。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同盟会”，确定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6字为革命纲领。最后陈天华与黄兴、马君武等8人被推举制订同盟会会章。这以后，陈天华几乎天天与黄兴一同，前往孙中山寓所与孙中山共同研究一系列革命问题。他浑身是劲，与几个月前以泪洗面的情形相比，简直判若两人。

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通过了由陈天华等人起草的同盟会《总章》和军政府宣言，会议公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庶务，协助总理主持工作，陈天华为书记。会议通过将《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改名为《民报》。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史上的里程碑。

陈天华在革命的潮流中，能够洞察革命形势的需要，力主实现各革命团体的联合，建立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充分反映了他对现实政治的真知灼见。他为中国同盟会的成立，热情地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当同盟会成立之时，清统治者为了苟延残喘，已决定用“君主立宪”来欺骗人民。资产阶级改良派开始大肆鼓吹君主立宪是中国唯一的出路。刚刚诞生的同盟会为揭穿清政府的阴谋，立刻把反击改良派的挑战做为一项重要任务。陈天华作为《民报》的经理和编撰人，立即挺身而出积极投入口诛笔伐，担当了革命派在这场大论战中的先锋。

此时，清政府为了欺编人民，派载泽、端方、戴鸿慈、绍英、徐世昌等五大臣前往欧美考察宪政，作出预备实行君主立宪的姿态。为此，改良派额手称庆，而读过《警世钟》的革命志士吴樾则不惜牺牲自己，以炸弹来“欢送”五大臣。9月24日，在北京前门火车站人群混乱，吴樾向五大臣专车进口处挤去，不幸，他怀中的炸弹突然被挤落爆炸，吴樾当场牺牲，徐世昌，绍英两人被炸伤。事后上海报刊竟指责这位牺牲的壮士是“丧心病狂”。陈天华怒不可遏，奋笔写了时评《怪哉》上海各学堂各报馆之慰问出洋五大臣》，强烈痛斥清政府。他还形象地把大臣出洋的骗局比做魔鬼画皮，指出吴樾为革命流血牺牲，就是撕去清政府假立宪的画皮，在改良派一致责难的喧嚷声中，陈天华率先颂扬烈士，代表同盟会阐明了对狙击出洋五大臣事件的态度，充分体现了他坚定的革命立场。除了此篇时评，陈天华在《民报》创刊号上还发表了《中国革命史论》、《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纪东京留学生欢迎孙君逸仙事》、《今日岂分省界之日耶》等战斗檄文，成为革命派对改

良派冲锋陷阵的一员猛将。同时，他还创作了宣传革命派政治观点的小说《狮子吼》。他把中华民族喻为一头睡醒后的雄狮，预示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表现了他对帝国主义的刻骨仇恨和对祖国的深厚情爱。当时读了《狮子吼》的人，无不感叹地说：“读此篇而不怒发冲冠，拔刀击案者，必非人也！”陈天华大力宣传爱国主义和民主革命思想，与改良派坚决作战，无愧为辛亥革命前期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

六、难酬蹈海亦英雄

中国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形势飞跃发展。日本的东京成为当时革命活动的海外中心。清政府为镇压革命运动，指令驻日公使杨枢乞求日本政府采取措施，取缔中国留学生的革命活动。10月，日本政府首先将孙中山驱逐出境；11月，日本文部省又颁布了《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严厉禁止中国留学生的革命活动，对学生的集会结社、议论通信等横加限制。

《规则》一发，留学生不胜其辱，奔走呼号，相约举行罢课，以示抗议。对此，日本各报竟肆意嘲讪，讥为“乌合之众”，《朝日新闻》更公然丑诋为“放纵卑劣”。留学生更万分恼怒，酝酿全体罢学回国。11月7日，在东京和京都的中国留学生8000多人，实行总罢课。“此次之抗争，合8000人而为一气，……盖自学界以来，团体之硕大整齐，未有如今日者也。”中国近代女革命家秋瑾亦慷慨陈词，力主回国，从事武装，她在演说中，随手从靴筒中取出倭刀，插在讲台上说：“如有人回到祖国，投降满虏，卖友为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事件初起时，陈天华异常悲愤，但又怕留学界不能团结一致，所以对罢课抗议尚有犹豫。及至见8000余留学生竟能同心协力地实行罢课，才不胜惊喜；中国留学生果然能团结起来，一致行动，就向全世界证明，中国人民不是一盘散沙，而是伟大的人民！惊喜之后，他又担心罢课难于持久不懈，以致证实日本报章的谰言蜚语。为此，他忧心如焚、愤恚难消，而此时他最崇敬的孙中山已到越南筹集革命资金，黄兴也回湖南策动武装起义，无法与他们商量。于是，他毅然决定以身投海，用自杀来震动国人，“有所警动”，“共讲爱国”；用自杀来激励留学生团结、斗争，用自杀来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不可辱，更不是下贱民族。

生长在民族沉沦的悲惨年代，陈天华多少次目睹山河破碎、黎民遭殃的惨剧，多少次悲愤填膺、痛不欲生。如今作出蹈海的决定，以一死报国，他的心甚感慰安，认为死得其所。1905年12月7日，他整整一天“握管作文字，至夜分不辍”，留下了一份约3000字的《绝命书》。文中，陈天华谆谆劝告中国的留日学生力除“放纵卑劣”此四字，坚持一心，贯彻始终，做到“坚忍奉公，力学爱国”，使日本报章种种诬陷不能得逞。他还告诫国人，决不要相信改良派的说教，“欲使中国不亡，惟有一刀两断，代满州执政柄而卵育之”。他的《绝命书》，闪耀着民主革命思想的光芒。8日，陈天华在东京大森町投海自尽。时年31岁。苍海浩渺，涛涌浪翻，一代英豪陈天华为国捐躯，他的精神则长存于天地之间。

噩耗传出，留学生界同声哀悼。《绝命书》，一经宣读，“听者数千百人，皆泣下不能仰。”中国留日学生大受震动，立即作出了集体归国的决定，数千名留学生罢课返国的行动，震惊了国际舆论。日本当局迫于此，不得不

对“取缔条约”作新的解释，承认留学生提出的一系列正义要求。

在陈天华的家乡，更是群情激愤，数千人参加了同盟会湖南分会组织的追悼大会。翌年5月，陈天华和在上海投江的姚宏业烈士的灵柩一同运回湖南。湖南学界在革命党人禹之谟、宁调元的领导下，要求将2位烈士公葬于湖南名山——岳麓山。当这些要求遭到官府的阻挠和恐吓时，各堂的学生以烈士们的敢死精神为榜样，群起抗争。出葬之日，长沙全城学生“万余人整队送葬”，一队抬着陈天华灵柩，一队抬着姚宏业灵柩，分两队前往岳麓山。送葬队伍缓缓前行，首尾绵延十余里，哀歌动地，祭炮震天。有人在回忆中记述当时情景：“适值夏日，学生皆着白色制服，自长沙城中观之，全山为之缟素。”沿途，官府派出的军警亦被震慑，呆立路旁，不敢干涉。这次公葬，实际上成了一次外争国权、内争民主的政治大示威，有力地推动了湖南革命形势的向前发展。

“长梦千年何日醒，睡乡谁遣警钟鸣？”陈天华，用他毕生之精力、顽强之精神，铸就的中华警钟，敲醒了一代国民，震动了神州大地，久久回荡，浩气长存。

邹容

一、罢科举

毛泽东说：“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近代中国新旧嬗代、激烈变化的特定的历史环境，蕴育、造就了无数志士仁人、革命英雄，他们在这狂飙突进的年代中，探索追求、弄潮鼓浪，迅速成长。为救亡图存，他们不惜用鲜血和生命“撞钟伐鼓”，来震撼中华大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邹容，就是这样一位优秀人物，他以极为短暂的一生，染就一面鲜红的旗帜，鼓舞和指引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投身于时代的洪流，汇聚、激荡成资产阶级革命的悲壮颂歌。

邹容，原名桂文，又称蔚丹、威丹、绍陶。1885年出生于四川重庆城内，因重庆府的府治与巴县县治同城，所以又称他为巴县人，父邹子璠，是一个拥资巨万的大商人。他一心期望儿子通过科举博取功名，在仕途上平步青云，以光宗耀祖，改变邹家“贬之曰末务，卑之曰市井，贱之曰市侩”的政治地位，但是，少年邹容并没有使他的父亲称心满意。

1891年，邹容6岁便随大哥蕴丹入私塾发蒙。由于自幼聪慧好学，大约十一、二岁的时候，就已熟读了《四书》、《五经》，诸如《史记》、《汉书》等名篇，也能成诵。但是，邹容对这些封建统治者所规定的功课，却日益感到厌倦。这时，酝酿已久的维新思潮正在发展成为维新运动。维新之风，已由北京、上海和广东、湖南等地，吹进了巴山蜀水。四川的维新人士与全国维新运动相呼应，在重庆创办了《渝报》，广泛地向群众灌输资产阶级改良思想。《渝报》介绍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宣传变法维新，其中连续刊载的著名的《时务论》尤其轰动。《时务论》不仅批评了洋务派投降媚外和舍本逐末，也斥责了封建顽固派所谓祖宗成法不可变的陈辞滥调，主张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变法维新一时，维新风气弥漫全川，给四川思想界带来巨大的震动，时代的启示，思潮的奔泻，使邹容开始仰慕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他的视线，渐渐地移向了以推介“新学”、“西学”为主的书刊。他于是开始接受另一种启蒙教育，并因此而在一定程度上萌发了批判封建文化，科举制度的感性认识，觉察到清朝统治的腐败和黯弱，也了解一些中国所面临遭受帝国主义分割的危机。同时，由于家庭出身的烙印，使他有改善中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地位的潜意识，他把自己的理想和发展资本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救亡图存事业联系起来。这样，邹容的思想和志向，就完全不符合父亲的要求，新旧冲突，终于在父子之间爆发。

1898年，刚满13岁的邹容，奉父命跟大哥一同应巴县童子试，这对他简直是一次难堪的折磨。他眼见和自己一起参加考试的那些皓首穷经的老童生，屡试不中，献身考场，真是不寒而栗。而且就算考得顺利，也要经过县试、府试、院试等多场考试，场场中试，才能考上一个秀才。然后考举人，考进士，逐级应试，为这种无用的八股文浪费几乎半生的青春和精力。他越想越感慨，越想越气愤。所以，刚进头场，他就对那以《四书》、《五经》经义为内容的词义晦涩的考题大为反感，加上僵化的八股文格式，丝毫无法发挥自己的思想，他实在忍无可忍，站起来同主考官辩论。他质问主考官：这种文不成义的题目究竟说些什么！说完，罢考离去。在那个年代，敢于如

此蔑视科举考场，实是大逆不道，弄得考官目瞪口呆。为此，邹容遭到了父亲的严厉责打。但他并不服气，倔强地向父亲申辩说：“臭八股儿不愿学，满场儿不愿入，衰世功名，得之又有何用？”就这样，邹容宣布了同科举制度的彻底决裂。

受了维新思想熏陶的邹容，还公开向封建主义文化挑战。孩子们必读的《神童诗》说“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他挥笔改为“少小休勤学，文章误了身。贪官与污吏，尽是读书人。”指出封建旧文化和教育制度是培养贪官污吏的大课堂，明确表示他拒绝学习的态度。以后，这种态度他坚持不懈，毫不放松。1901年，他还在给大哥蕴丹的信中恳切地劝告说“切无奔走城词章帖括中，以效忠于前人；其从事于崇实致用之学，以裨于人心世道也可”。指出：“近国家多难而必欲糜费千百万之国帑，以于百千万帖括、卷摺、考据、词章之辈中，而拣其一二尤者，于天下国家，何所裨益？”所以必定是“科举路从此绝矣！”

罢科举事后，邹子璠仍然坚持用封建主义的枷锁来驯教邹容，他迫令儿子进入重庆经学书院继续接受儒家经典的教育，但邹容仍不就范，在书院“指天画地，非尧舜，薄周孔，无所避”。“攻击程朱及清儒学说，尤体无完肤”。因此，尊古重道的书院院长将邹容开除。

1900年，邹容因反对科场舞弊导致了楼外楼事件，这年重庆举行府试，知府幕僚的义子名列前茅。榜发，议论纷纷，因为人所共知其子是个品学皆劣的纨绔，但慑于权贵，人们敢怒不敢言，邹容闻悉，大为不平。一天，他在五福宫的楼外楼见到那个幕僚和其义子在喝酒，便隔窗大骂。几天后，他又找到那义子的住处进行责问。为此，幕僚向知府告状，将邹容抓获。面对知府，邹容毫无惧色，直言不讳地说：“你们能徇私舞弊，我何以骂不得？”致使知府恼羞成怒。邹容对封建文化及其科举制度益发格格不入。他像当时许多先进的中国人一样，开始向世界寻求新知识。他不顾家里的反对，到日本领事馆向日本人学习日语和英语，并大量阅读介绍西方文明的书报。之后，他写起文章，发起议论来，亦日有新意。

在此前后，戊戌维新遭到扼杀，谭嗣同等“六君子”伏尸都门。消息传到四川，邹容大为激动，不胜愤慨。他无限景仰烈士“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英雄气概，冒着生命危险将谭嗣同的遗像悬于座旁，并题诗一首：

赫赫谭君故，湖湘志气衰。

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

这表明年仅14岁的他对新旧事物的鲜明爱憎，他的思想和政治态度是同维新变法息息相通的，并决心以“后来者”的身分，继承烈士爱国革新的事业。

邹子璠感到无法使儿子留连在科举的道路上，于是允诺他去应官费留日的考试。其目的在于另辟蹊径，让他留学回来获得朝廷赐予举人、进士的功名，仍然跻身官场。因为，清王朝业经下诏“变法”，盛传已有授予留学生功名官职的措施。不料，思想保守的舅父出来阻挠，说是让年少倔强的邹容远离家门，跑到外国去，必将闯出大祸，还会连累父母。邹子璠犹豫了。邹容知道了这个缘故，不顾一切，拿起菜刀要同舅父拼命。后经他母亲等人从中劝解，他才得以如愿成行。1901年7月，邹容冒盛暑从重庆步行到成都参加留学生考试，他满怀救国壮志，全不畏沐风栉雨，艰难跋涉，考场归来，因考试成绩甚好，由考试监督引见于四川总督。总督“勉励数语”后，命邹

容准备行装，俟时与第一批留学者同行。

留学生考试的胜利，为邹容展示了一条新的学习道路，梦寐以求的理想即将成为现实，他深深地沉醉于喜悦和憧憬之中。但是，正当他整装待发之际，他的留学生资格被突然地取消了。原来，清政府选派留学生的目的在于培养挽救统治危机的奴才。而思想激进、愤世疾俗的邹容被认为是“聪颖而不端谨”，最终未被录取。这件事，对年轻的邹容来说，是一次极沉重的打击，但是因进一步看清了政府的伪善和反动，也更坚定了他出国留学的决心，渴望摆脱传统桎梏、探索新知的迫切心情，促使邹容在父亲面前犯颜力争，多次劝服，几至决裂，最终说服父亲，得以实现自费留日的愿望。

当年深秋，16岁的邹容，乘木船从重庆出发，穿过三峡，顺流东下，为寻求救国之路，永远地离别了抚育他的巴山蜀水。

上海，是邹容去日本的第一站，为了尽快减少去日本学习的语言障碍，他进入江南制造局附设的广方言馆补习日语。在这里，邹容看到的是十里洋场和外国巡捕，看到的是为奴为仆的苦难人民，他对中国人民的命运、为中华民族的存亡更加忧心忡忡。

二、游海外

1902年春夏之交，邹容渡海到达日本，入东京同文书院学习。

还在19世纪末，日本就已经是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当时求进步的中国青年认为：要救国，只有维新，只有学外国，“唯游学外洋者为今日救吾国唯一之方针”。因此，20世纪初年起，留日学生人数骤增。当邹容来到日本时，中国留学生已近千名。这些新型的知识分子，在民族危难的刺激下，“感慨风云，悲愤时局，忧河山之破碎，惧种族之沦亡，多欲发奋为雄，乘时报国”。他们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西学的影响，思想较在国内活跃得多。其中已有一部分显露了革命的倾向，“头脑新洁，志气不凡”。他们开始形成了用资本主义改造封建主义中国的要求，并开始对改良派的保皇论调加以抨击。

邹容在这一时代到达日本，感到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就将在国内被压抑的思想情感，尽情地抒发出来。他在短短的时间里，攻读了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等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著作，以及美国独立、法国革命的历史，同时，还大量阅读了《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等留学生宣传革命的刊物。邹容在革命著作中找到了救国真理，无论是对民族危机，或是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了解，都比过去大大前进了一步。他已不再是谭嗣同等改良派的同情者和拥护者，而是由爱国而革命，为救国而反清，迅速成长为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先锋战士，冲上民主革命的战场。

1903年春节，1000多名留学生在东京骏河台留学生会馆举行新年团拜大会，这是一次宣传革命的大会。政治上接受了孙中山影响的留学生马君武在会上慷慨陈词，当着清朝驻日公使蔡钧的面，历数清朝的罪恶。邹容起而响应，发表演说，声言不推翻清朝政府的反动统治，就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这些愤激的言词，博得进步学生的热烈欢迎。会上，皇族宗室起来反驳，语未成章，被大众呵哄而止，蔡钧之流被邹容等人搞得狼狈不堪。之后，凡遇留学生开会，邹容必争先演说，“犀利悲壮，鲜与伦比”。他倡言对待清王朝，“不变法当革，变法亦当革”。他那敏锐的政治嗅觉，激进的反清立场，

充沛的爱国热忱，经常见于形色，溢于言表。国难出志士，时势造英雄，邹容在留学界，已是大家熟知的革命分子。

1903年春，邹容将他的革命激情和迫国赤诚凝聚笔端，全神贯注地撰写《革命军》一书。

正当邹容挥笔疾书，聚精会神地写《革命军》时，清政府派到日本管束留学生的学监姚文甫因奸情事被揭露，准备回国。姚文甫是一个凶狠而卑鄙的官僚，他多方箝制言论，屡屡迫害学生，为留学界所痛恨。于是大家决定借端发难，给他以制裁，煞煞敌人的威风。3月31日夜，邹容约集几个留学生，直入姚的寓所，历数姚的罪恶，并称“纵饶尔头，不饶尔辫”，拿出剪刀将姚的辫子剪断，限定他第二天早晨5时滚出东京，邹容等人又将姚的辫子悬挂于中国留日学生会馆的正梁上示众，题曰：“南洋学生监督、留学生公敌姚某某辫。”邹容等人疾恶如仇，不仅打击了邪恶、伸张了正义，而且蔑视王法，同清政府作了一次正面较量，“剪刀除辫人称快”，这件事轰动了留学界，进步学生无不拍手称快。清政府驻日公使蔡钧闻讯，大为恼火。他不只是感到“物伤其类”，更为惶恐的是，以为这是“犯上作乱”的开端，照此下去，自己也将无容身之地。因此，他立即照会日本外务省，要求到同文书院索拿邹容。他们甚至煽动说：“近来留学生之宗旨变坏，应推邹逆为祸首。”为暂时避祸，邹容遵友人规劝，离日回国。

邹容在《革命军·自序》中叙述这段经历说：“以辛丑（1901年）出扬子江，旅上海；壬寅（1902年）游海外，留经年。”他在日本仅仅不过一年，但在他成长的道路上却是关键的一年，他已从一个爱国者，成长为年轻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挟带着《革命军》书稿，立志为中国“竖独立之旗，撞自由之钟”。邹容将以全新的姿态投入于新的战斗。

三、斥保皇

20世纪初年中国的政治生活中，要推翻卖国清政府，就必须反对拥清的保皇党，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历史任务。邹容于1903年4月中旬返抵小别经年的上海，就读于由蔡元培任总理的爱国学社。便立即开始由反清的爱国民主斗争，进入到思想战线上对改良派的进攻。当时，学问文章已负时誉的章太炎在学社任教，他同邹容交往几次，就发现邹容才思敏锐，胆识超群，于是结为忘年交。并邀约张继、章士钊，四人结盟，以革命相勸勉。共同冲杀于对保皇党的反戈之战中。

这时，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新式学堂的兴办和留学运动的兴起，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要求摆脱封建专制主义的羁绊，抵制帝国主义侵略的愿望，在上海表现得日益明显。偕同这一新的经济和政治力量迅速增多的新式知识分子，也纷纷汇聚上海。于是新旧冲突，新兴力量反抗封建桎梏的斗争，就往往以“学界风潮”的形式展示出来。爱国学社就是1902年11月南洋公学退学风潮的产物，因此，学社里的政治空气异常活跃。感情奔放的青年，经常聚集一堂，在蔡元培、章太炎的启发下，意气风发，议论时政。师生们经常在上海著名的张园集会，演讲时事，倡言革命，其无所顾忌，俨然成了革命团体。这类引人注目的社会活动，也推动了一些报刊政治态度的转变。上海一份创刊于1896年名为《苏报》的日报，就反映了这种现象。1902年冬，它增辟“学界风潮”专栏，支持学生进步活动，发扬民主气氛，使其

销路大为改观。1903年初,《苏报》主持人陈范与爱国学社订约,由蔡元培、章太炎等轮流撰稿,它的销售量更是日益增长。

1903年,拒俄运动在全国兴起,其后,留日学生在东京召开拒俄大会,陈天华等组织“拒俄义勇军”,准备回国抗敌。25日,27日,上海绅、学、商各界爱国人士两次聚集于张园,举行拒法、拒俄大会。后又与东京留学生相呼应,在上海也组织义勇军。一时,反帝爱国运动在上海轰轰烈烈、急剧高涨。邹容一到上海,立即斗志昂扬地参加了运动。他发起创立中国学生同盟会,希望“于学界成一绝大合法团体,以鏖战于中国前途竞争撙之中。”后虽然由于邹容被捕入狱,组织未能成立,但也充分表明了他对建立统一革命组织的远见卓识。

随着拒俄运动因清政府的镇压而转变为革命运动,人民反清呼声大起。但与此同时,保皇派却摇唇鼓舌,大唱反调,主张向清政府请愿立宪,以图把运动引向歧途。保皇派的表演,使邹容对仍以“新”自居的改良派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他们反对革命、反对民主共和,其蒙蔽性、欺骗性更甚于封建顽固势力。“男儿自有男儿性,不到民权誓不休”。深重的民族灾难,敌人丑恶表演,逼使革命志士邹容立即披坚执锐,杀向思想战场。他一边钻研,一边战斗,向保皇党人散布的反革命言论猛烈开火。

1903年5月至6月间,上海《新闻报》抛出《革命驳论》一文,力倡保皇,反对革命。主张“天眷中国,对主当阳,内修政治,外联邦交,中国尤有可为”,如果闹革命,必至“内讧未已,外侮踵至”,中国必将由乱而亡。谬论刊出后,章太炎即针锋相对写了《驳革命驳论》。邹容在此篇末,就革命与改良谁是谁非问题,提出了重要的观点。指出:

总之,国民与政府主于对待之地者也。革命之权,国民操之,欲革命则竟革命;维新之权非国民操之,不操其权,而强聒于政府,亦终难躐此革命之一大阶段也。悲夫!放弃国民之天职,而率其四万万人之同胞,以仰以异种胡儿之鼻息,是又昌言维新者所挟以自豪乎?无量头颅无量血,即造成我新中国前途之资料,畏闻革命者,请先饮汝以一卮血酒,以壮君之胆,毋再饶舌,徒乱乃公意。

这段话告诉人们,革命的主动权操在国民手中,需要革命便可揭竿而起;维新则是要向皇帝乞求的,是要看政府的意愿的,统治者若不高兴,你必万般无奈。所以,维新断不可替代革命。这篇章太炎和邹容的文章,为后来革命派的《民报》和改良派的《新民丛报》之间的大论战打了头阵。

异常激烈的斗争和复杂的思想战线,要求革命者向人民提供全面阐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宣传品。于是邹容愈发以酣畅淋漓的笔墨,“宣革命之旨于天下”,写完了在东京已经着笔的《革命军》。他以“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署名,请章太炎修改。章太炎阅后,不禁击节赞赏,认为无需任何修饰。正是这样直率豪放、通俗生动的文字,才能够发挥广泛的宣传作用,才能具有鼓动人心的气势。于是,提笔写就一篇序文,称许《革命军》是“义师先声”。随即由柳亚子等筹集印刷费用,交大同书局录印。1903年5月底,《革命军》在上海出版发行。

四、《革命军》

“少年壮志扫胡尘,叱咤风云革命军”,凝结着邹容战斗豪情和美好憧

憬的《革命军》是他爱国主义与民主主义思想的结晶。这本被孙中山称赞为“今日国民教育之一教科书”的小册子，是中国人权宣言，是中国资产阶级反清革命运动的奠基作。

《革命军》计7章2万余言，全篇充满“革命”二字，包括：一、绪论；二、革命之原因；三、革命之教育；四、革命必剖清人种；五、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六、革命独立之大义；七、结论

内容上《革命军》首先揭起革命的大旗，开宗明义就以火热的激情、犀利的笔触，谱写出革命的颂歌：

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

这里，邹容把革命看成是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必然环节，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他反复强调一条真理，就是革命对于中国是事关存亡的大事，以革命求独立，以革命争生存，中国只有通过革命才能改变现状，才能有其将来。所以他说：

沿万里长城，登昆仑，游扬子江上下，溯黄河，竖独立之旗，撞自由之钟，呼天吁地，破颞裂喉，以鸣于我同胞前曰：呜呼！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20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

他还坚定地表示：“嗟乎！嗟乎！革命！革命！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毋退步，毋中立，毋徘徊，此其时也，此其时也！”号召人们只争朝夕地去干革命。在民主革命兴起之时，邹容不怕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力，以热烈的革命激情，提出鲜明的革命口号，具有强大的冲击力和重要意义。邹容以前，资产阶级革命者还没有比较系统的宣传革命思想的作品，《革命军》是一篇革命的颂词，是一篇真正伟大的宣传品。

接着，邹容用许许多多的具体的事例，历数清朝统治者对内暴戾恣睢，荼毒人民；对外卖国求荣，引狼入室的苛政罪行。指出：

今试游于穷乡原野之间，则见夫鬻其面目，泥其手足，终日劳劳而无时或息者，是非我同胞之为农者乎？若辈受田主、土豪虐待之不足，而满洲人派设官吏，多方刻之，经某官割某地之皮，而某吏吸某民之血，若昭信股票，摊赔款，其尤著者也。是故一纳税也，加以火耗，加以钱价，加以库平，一两之税，非五六两不能完，务使之鬻妻典子而后已。而又美名曰薄赋，曰轻税，曰皇仁。吾不解薄赋之谓何？轻税之谓何？若皇仁之谓，则是贼盗之用心杀人而曰救人也。

在此，邹容无情地剥开了封建统治者假仁假义的画皮。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邹容在《革命军》中毫不含糊地指出，清朝统治者不仅是国内被压迫民族的监牢，而且是帝国主义的走狗。鸦片战争以来，它把大片大片的中国领土奉送给帝国主义，“以买一家一姓五百家奴一日之安逸”，连他们自称为“祖宗发祥地”的东北，也听任沙俄恣意蹂躏。以致“杀一教士而割地赔款，骂一外人而劳上谕动问”，如此丑事，层出不穷。致使中华民族已处于“内受满洲之压制，外受列强之驱迫”的危殆境地，稍有迟疑，中国就会落入“十年灭国，百年灭种”的万劫不复的深渊。而目前，当务之急则在于“欲御外侮，先清内患”，要救亡，必先反清。这样，人们读了《革命军》就能获得中国革命的正义性、必然性、紧迫性的结论。在此之

前，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都曾以挽救中华为出发点，但是，都没有把打倒清王朝作为救亡图存的关键，结果均失败于中外反动势力的反扑和绞杀。邹容吸取了这些教训，在争取中华民族生存斗争之时，不再维护清王朝，而是主张坚决地推翻它。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

《革命军》不仅向君主宣战、向皇朝宣战，还对维护这一制度的封建意识形态进行抨击，提出了“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的思想革命任务。

邹容把“国民”和“奴隶”作为两个对立的名称，指出：中国人长期在黄龙旗下，“父以教子，兄以勉弟，妻以谏夫，日日演其惯为奴隶之手段”，不能叫国民，只能叫奴隶。奴隶不敢思考，不敢行动，更不敢反抗，只有逆来顺受，永远做封建主义的奴隶，做帝国主义的奴隶。

邹容揭示这种奴隶根性，指出“秦汉以后无国民”。因为中国长期在封建统治之下，“数千年来，名公巨卿，教师大儒，所垂教万世之二大义：曰忠、曰孝，更释之曰忠于君，孝于亲”，均是做奴隶的信条，是“中国人造奴隶之教科书也”。这些就是束缚中国人民的最大的精神枷锁。他引用一首《奴才歌》，辛辣地讽刺这一不许革命的奴隶哲学：

奴才好！奴才好！不管内政与外交，
大家鼓里且睡觉。古今有句常言道：
臣当忠，子当孝，大家且勿胡乱闹！

因此，邹容号召人民，要争当国民，反对封建思想和封建文化制度，拔去奴隶之根性。把“上下古今，宗教道德，政治学术，一视一听之微物”，统统进行革命的洗礼。他的这种认识，触及到了封建制度的上层建筑，对当时反封建有重大意义。

中国所要进行的是什么样的革命呢？邹容介绍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学说，明确地答复：“则吾请执卢梭诸大哲之宝幡，以招展于我神州土。”“欲求一革命之事，以比例乎英、法、美者。”对于美国资产阶级民主政体，他尤为倾慕，以为美国独立是革命的最高榜样，所以，他着重“模拟美国革命独立主义”，提出了在中国革命建国的二十五条纲领，并以此做为奋斗的目标。这些纲领的主要内容是：

先推翻满清朝野蛮政府；
诛杀清朝皇帝，以儆万世不复有专制之君主；
敌对干预我中国革命独立之外国及本国人；
凡为国人，男女一律平等，无上下贵贱之分；
不得侵人自由，如言论、思想、出版等事；
无论何时，政府所为，有干犯人民权利之事，人民即可革命，推倒旧日之政府，而求遂其安全康乐之心；
定名中华共和国；
中华共和国为自由独立之国。

这些纲领充分体现了“主权在民”的思想，指出如果政府“日其弊端暴政”，人民就应起而颠覆之，这不仅是人民的权利，而且是人民的义务。它浸透了革命民主主义精神，体现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具有深刻的革命意义。

《革命军》第一次把“中华共和国”的名称公之于世，并在全文末充满信心地呼唤：“中华共和国万岁！”“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以激昂慷慨的口号表达他对祖国、对人民的热切祝愿。

自从《革命军》出版以后，反清革命运动的政治前途是建立共和国也就成为了定论。

五、《苏报》案

清王朝对革命的镇压，随着革命思想的传播日益加紧，《革命军》的问世，使心惊胆颤的统治者再也按捺不住，于是，于1903年6、7月间，制造了震动中国，亦为外国注目的苏报案。

《苏报》在蔡元培等人轮流投稿时，就已成为爱国学社发表政论的园地。章士钊接任主笔后，于6月1日宣布“大改良”，自是言论更趋向激进，仅清的文词，连篇迭出，直言放论，无所忌惮。从6月1日到7月7日报馆被封，仅37天中就刊登革命论谈40篇。其中有《读革命军》《介绍革命军》等文章，盛赞“其宗旨专在驱除满族，光复中国，笔极犀利，文极沉痛。……若能以此书普及四万万人之脑海，中国当兴也勃焉”。又刊登《读严拿留学生密谕有感》、《贺满洲人》、《杀人主义》等文，6月29日，《苏报》摘登章太炎的《驳康有为书》，该文不仅驳斥了康有为的谬论，论证了革命是最大的权威，还大胆地把保皇党人奉为“圣上”的光绪斥为“载小丑，未辨菽麦”。这使清政府大为恼火，开始了对革命党人的迫害。

清政府曾因张园集会事，已传出将予查禁，以免蔓延的企图，但因爱国学社和苏报馆都设在上海的租界，而清政府还没来得及同租界的殖民机构——工部局串通好，所以一时尚未发作。及《革命军》的《驳康有为书》相继出版，清政府即电令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查，禁爱国学社的活动和《苏报》，饬令“严密查拿，随时惩办”。之后，上海道与工部局勾结起来，策划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抓人。

6月30日，巡捕和警探闯入爱国学社，气势汹汹地指名要捉蔡元培、章太炎、邹容等人。蔡元培已事先到了青岛，报社老板陈范亦连夜走避。章太炎当时正在帐房里，他面对凶神恶煞的警探，当即起身从容不迫地说：“余人都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于是他被扣上手铐，带入巡捕房。邹容此时正避在一个外国传教士家中，得到章太炎的函召，他不愿置身事外，让章太炎一人承担牢狱之灾，便以生死与共的态度，在7月1日自动到巡捕房投案。《苏报》一案，连邹容在内，前后一共被捕去6人。7月7日，《苏报》和爱国学社被封。

按清政府的意图，是要求租界当局将所捕诸人引渡出界以便惩办，意欲将章太炎、邹容押解南京加以杀害。但能否引渡，并不取决于清方代表的要求，还要看帝国主义愿不愿意。对于这一案件，帝国主义各国各怀鬼胎，态度不一。美、法、德、俄赞成引渡，沙俄公使称：邹容等人“欲在中国行革命之事，废去满洲王室，实为大逆不道”。竭力主张“将此数人交与华官”。英租界当局虽也愿意协助清政府镇压革命，但又要维护租界的殖民主义权益——“租界治权”，所以说苏报案是“租界事，当于租界治之”。声称“外人在租界一日，即有一日应得之权利”，不答应清政府的引渡要求。官府怕洋人，洋人不同意，清政府也万般无奈，束手无策。

这时，清朝统治者秘密将革命志士沈荃鞭死一事已宣泄于外，引起国内外舆论的极大愤慨。因此，苏报案一发生，舆论界就一致反对租界当局将章太炎、邹容等移解南京。这样，帝国主义对引渡一事就更有所顾虑了。于是

决定，由会审公厅审讯在押各人。

7月15日，租界公审公廨组织了所谓的额外公堂，对章太炎、邹容等进行非法审讯。会审一开始，章太炎、邹容的辩护人就指出：根据法规，有被告而无原告，狱案不能成立。并质问，此案的原告到底是谁？会审官突然被问，不知所措，只得勉强答曰：中国政府。于是清政府便不惜有辱国体，自当原告，章太炎、邹容则作为被告，构成了政府和私人的官司的怪事。法庭上，清朝政府的代表，摘引《苏报》的反清文章，指控章太炎、邹容“故意污蔑今上，心怀叵测，谋为不轨”。章太炎、邹容以顽强的革命精神，在法庭上进行坚决的斗争。邹容大义凛然、威武不屈，大声宣称：“因愤满人专制，故有《革命军》之作。”他同章太炎一道，异常自豪地以“汉种四万万人之代表”的身分，同清王朝的官员和雇请的律师公庭对簿，义正词严地驳斥清政府的起诉，为革命申辩，一再使作为“原告”的清王朝贻羞出丑。邹容、章太炎代表正义的中国人民，反客为主。“纵使不成头被砍，也教人间称好汉。”通过这桩苏报案，邹容向全社会控告了清王朝丧权辱国、残害人民的罪行，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敌人的威风。

经过几次会审，后又拖延至1904年5月，法庭才最终宣判章太炎监禁3年，邹容监禁2年，并罚作苦工。

“压力愈大，质量愈坚；磨练愈深，锋锷愈锐。”自被捕入狱起，邹容就抱定为革命牺牲的决心。他与章太炎在法堂上，怒斥清庭，正义凛然；在铁窗内，又赋诗明志，互相砥励。这些抒发革命感情的战斗诗篇，先后秘密传出，刊载于革命报刊上，成为支支利箭，继续发挥反清爱国的战斗作用。

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
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糍。
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
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

7月22日，章太炎吟哦此《狱中赠邹容》一诗，回忆邹容为追求真理、赴日留学的往事，并希望与其紧握双手，并肩前行，为革命慷慨献身。邹容随即赋诗作答：

我兄章枚叔，忧国心如焚。
并世无知己，吾生苦不文。
一朝沦地狱，何日扫妖氛。
昨夜梦和尔，同兴革命军。

他庆幸自己有章太炎这样一位学博节高的师长作为“知己”。且在诗中充分表现了革命者勇于献身、临危不惧的高尚情操和英雄气概。即使身陷囹圄，依然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他在诗中展望了与章太炎“同兴革命军”、驰骋“扫妖氛”的壮丽前景。

31日沈荇被秘密鞭死的消息传到狱中，邹容和章太炎无比愤慨，立即同声谴责清政府的滔天罪行。邹容写出了题为《和西狩 狱中闻沈禹希见杀》的诗句：

中原久陆沈，英雄出隐沦。
举世呼不应，抉眼悬京门。
一瞑负多疚，长歌召国魂。
头颅当自抚，认为墨新坟。

诗中的沈禹希即沈荇，西狩是章太炎的署名。通过这首诗，邹容表达了

自己悼念烈士，痛恨清王朝的感情，表明了为革命牺牲的壮志，呼唤人民继续他们的革命事业。全诗爱憎分明，从容慷慨。

邹容、章太炎“相延入狱，志在流血”，他们既敢绝命，便不惜命，便把革命者高尚的理想，坚强的信念，视死如归的精神，均赋于诗句，跃然纸上。“愿力能生千猛士”，邹容在狱中一心关心革命，憧憬着以自己宏大的“愿力”，唤起千百万个猛士，高举共和的大旗，不避艰险，勇敢作战。因为邹容在狱中坚持斗争，经常遭受狱吏的侮辱，加上伙食差，情绪激愤，身体状况越来越差。经年累月的折磨，使他在离“刑”满出狱只有两个多月时不幸病倒了。章太炎再三向监狱长交涉，要求找医生为邹容治病，竟被无理拒绝，直到病情十分险恶，才允许保释就医。1905年4月3日凌晨，邹容突然死于狱中，年仅20岁。死时口吐鲜血，人们都怀疑他是为中外反动派毒杀致死。

邹容死后，监狱把他的遗体弃置墙外，后由他的同乡收殓，停放在四川义庄里。噩耗传出，中国教育会立即为他召开追悼会。上海和日本的一些革命刊物也纷纷刊载诗文，悼念死者。革命者的血，是战斗前进的最好旗帜。这些哀悼活动，正是代表千百万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强烈抗议。次年3月，邹容的遗骸由同盟会会员、革命志士刘三（季平）冒着毁家杀身的危险运出，完葬于上海县华泾乡黄叶楼旁。

清政府把《革命军》视作眼中钉，妄图连人带书毁之而后快，为之勾结帝国主义制造了苏报案。但形势的发展同清统治者的愿望恰好相反，经过这一案件，清王朝愈益遭到人民的憎恶，革命的浪涛更加澎湃高涨。

六、革命潮

“建共和、革命之两大旆，撞钟伐鼓满天地。”邹容以短暂的年华，揭起革命和共和两大旗帜，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自由幸福，建立了不朽的勋业。他的功业主要有两大端：一是撰写了《革命军》一书，“以宣布革命之旨于天下”。二是他和章太炎一道，在清政府制造的苏报案中，以凛然不可侵犯的气概、沉毅果敢的胆略，挫败了清政府妄图遏抑革命潮流的预谋。事实表明他是如愿以偿的。

伟大的思想家鲁迅先生曾说：“便是悲壮淋漓的诗文，也不过是纸片上的东西，于后来的武昌起义怕没有什么大关系。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事实如此，《革命军》出版后，翻印流传极广，风行于海内外。

上海一学堂的学生，借到一本《革命军》，竞相传阅，甚至连夜燃烛轮抄。

1903年，四川革命者卞鼐倾家筹资赴上海购买《革命军》，携回重庆散发。

黄兴由日本回湖南组织华兴会，翻印《革命军》4000余本，“散发到军商各界”。

孙中山携带部分《革命军》到檀香山向华侨宣传革命，被华侨索取一空。

1904年孙中山在旧金山，刊印《革命军》1.1万册，分寄美洲南洋各地。

1906年，孙中山致书张永福，并寄《革命军》一本，要求照此版式“从速印之，分派各处”，“必能大动人心，他日必收好果”。

与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合刊称《章邹合刊》，刊印 20 多版，销售达 110 万册。在清末革命书刊的销行数中位居第一。

在《革命军》的鼓动下，资产阶级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武装起义，直至武昌一役，推翻清朝政府，最终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建立了邹容在《革命军》中呼唤的共和国。

“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邹容在《革命军·自序》中引述的这两句别人讴歌法国近代思想家卢骚的诗句，也正是他的《革命军》宣传功绩的写照。在中国近代革命的峥嵘岁月中，《革命军》掀动的革命之潮，最终收取了资产阶级革命成功的巨大功绩。

少年壮志扫胡尘，叱咤风云革命军。

号角一声惊睡梦，英雄四起挽沉沦。

剪刀除辫人称快，铁槛捐躯世不平。

风雨巴山遗恨远，至今人念大将军。

无产阶级革命家吴玉章的这首《纪念邹容烈士》诗，概括了邹容革命的一生，也道出了人们的怀念。邹容有生的短短 20 年，如炬火，如明星，划破中国近代的黯黯黑夜，虽陨尤灿。1911 年，邹容为之奋斗、牺牲的资产阶级的中华民国终于成立，翌年，身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为表彰邹容的功勋，追赠他“大将军”荣衔。从生前自称“马前卒”，到死后被追赠为“大将军”，邹容的功绩彪炳史册，成为一代又一代青年的榜样。

